

任访秋文集

古代文学研究 中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• 郑州 •

编委会

主 任 关爱和 刘增杰

委 员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马小泉	白春超
关爱和	任 光
刘增杰	刘进才
刘 涛	刘小敏
朱秀梅	张云鹏
张先飞	李国平
李 敏	沈红芳
杨萌芽	杨站军
孟庆澍	侯运华
胡全章	郝魁峰
高恒文	袁喜生
解志熙	靳宇峰

总校阅 任 光

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主要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的汇编。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,对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家和主要作品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研究。这些论文,都具有他自己的见解,对古典文学研究作出一定的贡献。

本书包括的杰出作者有屈原、司马迁、曹氏父子、郦道元、韩愈、柳宗元、袁中郎、吴敬梓、龚定庵、章太炎等;包括的主要作品有《文心雕龙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今古奇观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红楼梦》等。

此外,还收入了《胡适〈五十年来的中国之文学〉的批判》。

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^①

(存目)

伟大的现实主义散文作家司马迁^②

(存目)

①② 本文原载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集》(长江文艺出版社,1956年),此次整理仍将其收入原书,此处仅作存目处理。

三曹诗歌试论

(一)

建安文学,是我国中古文学史上一个极其辉煌的时期,而三曹,正是这个时期诗坛上闪烁着异样光芒的巨星。我们为了更清楚地理解三曹的诗歌,所以首先需要对建安文学的产生和它独特的文学风格,作一简括的论述。

“建安”,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,公元 196 到 221 年,约二十五年。从时代上看,正是汉末天下大乱,北方各大豪强互相混战,互相兼并,最后逐步趋于统一的时代。在当时北方许多大豪强中,出现了一个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的曹操,他代表了当时中下层地主阶级,在汉灵帝末年,曾镇压并改编了起义的黄巾军,从而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团。后来他率兵迎献帝,由洛阳迁都许昌,改年号为“建安”。实际这时的刘协,已成为他政治上的傀儡,借天子的名义,来实现他大一统的政治目的。不久他在北方就消灭了吕布,击败了袁术,荡平了袁绍,刘备在他的追击下,也不得不狼狈逃窜,投奔刘表。直到建安十三年赤壁战后,曹操失败,从此才形成了曹、刘、孙鼎足三分的形势。

曹操统一了北方之后,就逐步地实行恢复生产的各种措施,如推行屯田制,废除汉代的租赋制度,严禁豪强兼并,禁止豪强逼迫下户

贫弱代出租赋，督促对荒田的开垦等。在开源的基础上，曹操更进一步的自己带头提倡节约，他自己讲：“吾衣服皆十岁也，岁解浣补纳之耳。”（《全三国文》卷三）同时《魏志·卫觐传》载觐上疏，谓：“武皇帝之时，后宫食不过一肉，衣不用锦绣，茵蓐不缘饰，器物无丹漆”，因此形成风气。《魏志·和洽传》，洽言：“今朝廷之议，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，谓之不清；长吏过营，形容不饰，衣裘弊坏者，谓之廉洁。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，藏其舆服，朝府大吏，或自携壶飧，以入官寺。”古人说：“俭以养廉”，当时政府官吏对生活条件要求不高，自然对人民就可以少剥削一点。由于生产的恢复，社会秩序的逐步安定，这样就构成了建安文学所以能够繁荣的经济基础。

曹操对文化也是很注意的，这自然是与巩固他的政治统治有关。在他依次征服其他大豪强的过程中，把当时出身士族，依附于那些豪强的知识分子，都网罗到他的部下，如在打败袁绍之后，就得到了陈琳，特别在刘琮投降之后，当时在荆州的文人学者如王粲、宋忠等都到了北方。荆州在北方大乱时，关西、兖、豫学士到那里避难的以千数，一时形成了中国文化学术的中心（《后汉书·刘表传》），刘琮投降后，大半随曹操到了北方，从此中国文化学术中心，遂从南方转移到北方。在文士方面，曹操用各种方法来网罗这般人，甚至像阮瑀不愿作官，曹操竟用强制的方法，逼他出来。（《魏志》注引《文士传》）正如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中所说：

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，昔仲宣独步于汉南，孔璋鹰扬于河朔，伟长擅名于青土，公干振藻于海隅，德琰发迹于大魏，足下高视于上京……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，顿八紘以掩之，今悉集兹国矣。

曹操所以网罗这些文士，主要的自然是让他们为他的政权服务，但同时也防止他们在外边捣乱，或为敌国所利用，不利于他的统治。可是也正因为这，建安文坛才形成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局面。

曹操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，是他的“轻经术而重词章”。据说这是与他的家庭教育有关，并且和他的政治企图也有关。《后汉

书·杨赐传》：

今妾媵、嬖人、阉尹之徒，共专国政，欺罔日月。又鸿都门下，招会群小，造作赋说，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，如欢兜、共工，更相荐说，旬月之间，并加擢拔。

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，也有同样的记载。由此可知，汉末灵帝喜欢文学，而一班宦者为趋承皇帝的爱好，于是相率崇尚辞赋，因而一时成为风尚。曹操的父亲嵩，为中常侍曹腾的养子，他之喜欢文学，自与他所受的宦官的家庭教育有着极密切的关系。由于他的喜爱文学，所以他的儿子丕、植、彪等，也都擅长文学。此外当时的经术都是为士族和大封建主刘氏的统治服务的，这对于曹操的取刘氏而代之的政治企图，是极为不利的。所以他之轻经术，重词章，对用人提出“盗嫂受金”，亦可以“明扬仄陋”的重能而轻德的倾向，都是在一反汉代的习尚，为他的代汉开拓道路的。

还有当时文艺批评的兴起，这是曹操崇尚刑名和法治的结果。汉末，士大夫批评政治的风气很盛，当时号称“清议”。后来党锢之祸，就是由此引起来的。及曹操当国，与党锢有关系的人物孔融，是当时的大名士，他常常讥刺时政，曹操后来就借不孝之名，把他杀掉了。还有像狂放的名士祢衡，也被他赶到了江夏。这对当时来说，不仅在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影响，就是对学术文化，也起着不小的作用。由于清议的被摈斥，于是代之而兴的是玄学的清谈，与文学上的批评。在建安时期，文学批评已经逐渐兴起，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中所讥讽的“好诋诃文章，诋摭利病”的刘季绪，看来就是一个专门的文学批评家。至于曹丕作《典论·论文》，又可以说是作家而兼批评家。文学批评的兴起，说明了文学创作的繁荣。因为一般的文学批评，都是在创作繁荣的基础上产生的。但又由于文学批评的兴盛，就反过来推动并指导了文学的发展与繁荣。

总起来说，建安文学的出现，是有其时代的原因的。而这种原因，主要是由于北方秩序的渐趋安定，生产的逐渐恢复与发展，统治者的网罗文士，重视文学，并提倡文学，以及在政治与学术上的各种

措施,直接或间接对文学的有利影响,于是才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。

建安文学所以昌盛的原因,已如上述;至于建安文学在风格上,也有它的时代特色。鲁迅先生论汉末魏初的文学,把它归纳为八个字,即“清峻,通脱,华丽,壮大”。他解释这种风格产生的原因,“清峻”是由于曹操崇尚刑名,立法极严,影响到文章方面,成了这样风格,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。“通脱”就是随便的意思,也就是打破了儒教思想的束缚,影响到文章上,便是做文章没有顾忌,想说什么便说什么,曹操的《董逃歌词》中曾有“郑康成行酒,伏地气绝”的句子,即是一证。“华丽”是由于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提出“诗赋欲丽”。“壮大”则是曹丕又提出“文以气为主”,因此华丽外加上壮大。((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))这个看法,是很对的。但我还认为,文学是客观现实生活的反映,而文章风格乃是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特点的集中表现。汉末魏初,也就是建安时代,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,在政治上曹操的崇尚刑名,在学术上轻经术重词章,这些措施反映到文学上,必然形成“清峻”,“通脱”与“华丽”的文风。而“壮大”则是由于当时的大乱,人民的流离死亡,以及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和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化,战争、灾荒、流疫,经常威胁着人们,老弱转乎沟壑,壮者散而至于四方,富贵贫贱,生死存亡的无常,这样的生活反映到作品中,就构成了慷慨悲凉的气氛。其次汉末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刚直果敢的精神,具体表现,就是党锢之士对当时黑暗现实所进行的斗争,到了建安这种精神表现之于诗文,于是便具有刚劲豪放的气魄。总之,建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代,一个转折的时代,当时诗人生活在离乱的环境中,必然要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哀乐,共呼吸,他们在作品中不仅反映出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,而且也反映出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,因而才形成了这个时期诗歌的特殊风格,所谓“建安风骨”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时序篇》中有段话讲得很好,现把它节录在这里:

自献帝播迁,文学蓬转,建安之末,区宇方辑,魏武以相王之

尊，雅爱诗章，文帝以副君之重，妙善辞赋，陈思以公子之豪，下笔琳琅，并体貌英逸，故俊才云蒸。……观其时文，雅好慷慨，良由世积乱离，风衰俗怨，并志深而笔长，故梗概而多气也。

(二)

建安诗人中，曹氏父子不只在政治倾向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坛，而且他们的作品，也给当时作家树立了光辉的典范。现在论三曹诗歌，首曹操，次丕，再次植。

曹操是汉末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，正如当时许子将对他的批评是“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”（《魏志》卷一注引《世语》）。平时以余力从事诗歌的写作，所以留传下来的诗章不过才二十多首。但就从这极少的作品中，也可以看出他的卓越的创作才能。它们不像一般文人们的无病呻吟，或“为艺术而艺术”，绝大部分是有所为而发。它具体表现了大乱时期的人民痛苦生活和极其悲惨的景象，同时也表现出他对现实的态度，对政治的愿望与理想。从而诗人自己的面貌，也就从这极少的篇章中呈现了出来。

诗中反映董卓之乱与诸豪强互相兼并，连年战争，造成人民的深重灾难的有《薤露》与《蒿里行》。在《薤露》中，首先抨击了灵帝时在朝大臣何进等，说他们是“沐猴而冠”，“知小谋强”，还妄想革改朝政，终于不但是与事无补，反首先受到了灾殃。下边接着抨击了董卓，并对洛都的破坏，人民的遭受掳掠，表示无限的愤慨和悲痛。

贼臣持国柄，杀主灭宇京。荡覆帝基业，宗庙以燔丧。播越西迁移，号泣而且行。瞻彼洛城郭，微子为哀伤。

《蒿里行》写董卓大乱以后关东诸豪强互相兼并：

关东有义士，兴兵讨群凶。初期会盟津，乃心在咸阳。军合力不齐，踳踳而雁行。势利使人争，嗣还自相戕。淮南弟称号，刻玺于北方。

接着刻画了众豪强的斗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惨痛苦难：

铠甲生虱蝨，万姓以死亡。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遗一，念之断人肠！

这与曹丕《典论·自叙》中写当时丧乱情况：“乡邑望烟而奔，城郭睹尘而溃，百姓死亡，暴骨如莽”相印证，这确可以称为当时的史诗。

其次反映在战争中战士们长期的在外抱着深切的怀乡心情的有《却东西门行》。而在《苦寒行》中，更具体地描写了在战争中行军的艰苦生活：

我心何怫郁，思欲一东归。水深桥梁绝，中路正徘徊。迷惑失故路，薄暮无宿栖。行行日益远，人马同时饥。担囊行取薪，斧冰持作糜。悲彼《东山》诗，悠悠令我哀。

像这些诗，不只表现出诗人当时的心情，同时也表现出当时所有从征的战士们的心情。

曹操在当时是政治上的一位野心家，他瞧不起当时与他并世的那般大豪强，他有着政治上的宏图。他出身于一个宦官家庭，不是出身于豪门士族，在他统一了北方之后，几次想取汉室而代之，但是每次都遭到当时士族出身的一些士大夫们的阻挠，因此他只得以历史上的文王周公自比。在《短歌行》中他歌颂了文王，以及五霸中的齐桓、晋文，还有辅佐成王的周公，说明这些人虽说功业已经非常的烜赫，但他们并不去作天子，还是臣于天子，辅佐天子。这篇诗的中心思想，实际也就是他对当时一般士族出身拥护汉室的士大夫们的自我剖白，同他的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中的有些话意思是一致的。

至于他对政治的理想，具体表现在《度关山》《对酒》《秋胡行》诸作中。这种理想政治，也就是封建时代所称道的“太平盛世”。朝廷在任用人上，是“王者贤且明，宰相股肱皆忠良”；在风俗上，是“咸礼让，民无所争讼”；在生产上，“三年耕有九年储，仓谷满盈，斑白不负戴，雨泽如此，百谷用成，却走马以粪其土田”；在政治上，“爵公侯伯子男，咸爱其民，以黜陟幽明，子养有若父与兄，犯礼法，轻重随其刑”；终于达到“路无拾遗之私，囹圄空虚，冬节不断，人耄耋皆得以寿终，恩德广及草木昆虫。”

这种理想,在今天看来,算不得什么,所谓太平乃是在封建统治下,阶级矛盾的和缓,人民的安居乐业。但是在那样时代,统治者肯于向劳动人民让步,真正能达到这样地步,人民还是欢迎的。另外曹操是提倡节约,反对淫侈的,这是比较明眼的统治者,看到有些统治者由于过着侈靡的生活,加重对人民的剥削,结果引起人民的起义,把这作为自己的鉴戒。在《度关山》中:

嗟哉后世,改制易律,劳民为君,役赋其力。舜漆食器,畔者十国。不及唐尧,采椽不斫。世叹伯夷,欲以厉俗。侈恶之大,俭为共德。许由推让,岂有谄曲。兼爱尚同,疏者为戚。

曹操能够以身作则的来提倡节约,一时成为风气,这在前边已经论到。总之,曹操在政治上有理想,并且用具体措施,来实现自己的理想,所以才能统一北方,省刑薄赋,发展生产,在大乱后极端残破的废墟上,竟然逐渐出现了一个小康的新局面。

另外曹操在世界观上也存在着积极入世思想,与消极颓废思想间的矛盾。即如在《气出唱》《陌上桑》《秋胡行》等篇中,羡神仙的长久,《短歌行》中叹人生的短暂,反映出当时一般剥削阶级的消极思想。但是他的主导思想还是积极入世的,因而最后还是批判了这些消极的成分。在《秋胡行》中归结为:“不戚年往,忧世不治,存亡有命,虑之为蚩。”《短歌行》中又归结为:“山不厌高,水不厌深,周公吐哺,天下归心。”特别是在《步出夏门行》中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,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等句,更突出地表现出他那种豪情壮志,不肯伏老的精神。

总之,我们从以上诗篇的内容分析来看,对汉末政治舞台上人物的抨击,对大乱惨象的刻画,在政治上歌颂了历史上的政治家,并用以自况,表现出个人的政治理想和为实现这种理想的雄图壮志,这不活活地刻画出一个“拨乱世之英雄”的形象吗。

孟德诗的语言非常质朴自然,不甚雕饰。但由于他用白描的笔墨,刻画自然景物,因之让读者如置身于诗情画意中。即如《步出夏门行》:

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。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。树木丛生，百草丰茂。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。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。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。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。

这是一幅多么壮丽的海的图景。从浩淼无际，一片汪洋，写到竦峙于海滨的山岛，又写到山岛上的景物。接着写秋风，和被风吹起的波浪，最后又写出天空日月从天际升起，星辰反映到海里，令人感到它们是从海里出来的。这里边没有对偶，甚至是不避重复，如前边用“若出其中”，后边接着又用“若出其里”，都说明他的诗的特点。毛主席是很欣赏这篇作品的，在《北戴河》一词中，开始赞颂了海的壮丽，接着联想到曹操这篇作品，写道：“往事越千年，魏武挥鞭，东临碣石有遗篇。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！”所谓“景物犹是而人事已非”。但这不同于古代文人的吊古伤今，恰恰相反，乃是今天的天下，已是人民的天下，今天的天下，已是统一的天下，与曹操征乌桓时那种豪强割据，民族分裂，人民受着封建统治的奴役与战争威胁的情况，完全不同了。

过去论曹操诗歌风格的，如钟嵘谓：“曹公古直，甚有悲凉之句”（《诗品》）。胡应麟谓：“其诗豪迈纵横，笼罩一世”（《诗薮外编》卷一）。刘熙载谓：“曹公诗，气雄力坚，足以笼罩一切”（《艺概》卷二）。都说明他的诗歌是苍凉悲壮。这种风格的形成，一方面与当时乱离的现实有关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在当时所处的地位，以及他自己特有的世界观，他对宇宙对人生的看法，对现实政治斗争的态度。所以反映到他的作品，就形成他自己独特的风格。

曹丕是操的长子，操死后不久，即代汉称帝。他幼承家学，也很喜爱文学，从他给吴质的两封信以及《典论·论文》看来，他不只是礼遇文士，同时还深切的了解文学的价值，创作的利病，和评价作品的优劣，和汉武帝的以倡优看待文人的态度，是截然不同的。由于赤壁战后，三分之局已定，生产逐渐恢复，人民稍得苏息，加上他们父子对文学的提倡，这时诗歌的倾向，由反映乱离，转而趋于流连光景与歌颂功德。正如刘勰所说的：“怜风月，狎池苑，述恩荣，叙酣宴。”（《文

心雕龙·明诗》)于是风格为之一变,过去的慷慨悲歌,一转而为雍容闲雅。

曹丕的诗作流传下来的,也不太多,仅仅不过三十几篇。但是从这些篇子中,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时代的面貌和各个阶级的生活。首先值得注意的,是反映乱离的,有《陌上桑》《黎阳作》《令诗》等。前一篇写一个从军出征的战士,远离故乡,所看到的一片荒凉景象,野兽纵横,荆棘满目,个人零丁凄苦的悲怆心情。《黎阳作》写在行军中路过自己的旧居,所见的情况。而末一篇,则写丧乱之久而人民的死亡之惨。

其次反映现实中贫富阶级生活悬殊的,有《上留田行》,所谓:“居世一何不同,上留田。富人食稻与粱,上留田。贫子食糟与糠,上留田。”但是指出了阶级矛盾后,接着就又用宿命论来解消矛盾,所谓“禄命悬在苍天”,“今尔叹息将欲谁怨?”正说明了统治阶级用这种思想,来麻醉人民,使他们安于自己的奴隶生活。

此外有驳斥求仙为虚妄的《折杨柳行》,在神仙方士之说流行的时候,而指出:“王乔假虚辞,赤松垂空言。达人识真伪,愚夫好妄传。追念往古事,愤愤千万端。”这种见解,还是比较高明的。

曹丕还有不少的抒情篇子,反映出当时剥削阶级颓废消极享乐腐化的思想。这些都是不健康的思想,是应该批判的思想。一种是近于古诗十九首中的“万岁更相送,圣贤莫能度,不如饮美酒,被服纨与素”的及时行乐思想,这就是《善哉行》中的“人生如寄,多忧何为,今我不乐,岁月其驰”。再一种也近于古诗中的“何不策高足,先登要路津。无为守贫贱,坎坷常苦辛”的思想,这就是《大墙上蒿行》:“人生居天壤间,忽如飞鸟栖枯枝。我今隐约欲何为,适君身体所服,何不姿君口腹所尝,冬被貂襜温暖,夏当服绮罗轻凉。行力自苦,我将欲何为!”还有写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,如《杂诗二首》里边特别是“西北有浮云”一篇的“弃置勿复陈,客子常畏人”,刻画心理真实,为后人所称道。《燕歌行》写男女离情别绪,也都悱恻动人。从以上这几类作品中,我们可以听出当时一般士大夫阶级的心音。最后曹丕

还有一些写他同文士们游宴生活的篇子,如《于谯作》《芙蓉池作》《于玄武陂作》等。写出征生活的,如《黎阳作三首》《至广陵于马上作》《黎阳作》等。一方面反映了贵族们的侈靡享乐生活,另一方面也显示统治者对于自己武功的粉饰和夸张。

曹丕的诗在风格上清丽自然,在形式上,语言上,受民间乐府的影响极大。首先他的《燕歌行》,全篇七言,为后来七言诗之祖。但这应该说是曹丕学习民间文学的形式,而把它加以改造的结果。其次诗中比拟源于民歌的,如《临高台》的“鹄欲南游,雌不能随。我欲躬衔汝,口噤不能开。欲负之,毛衣摧颓。五里一顾,六里徘徊”系本于乐府古辞《艳歌何尝行》,而又略加改变。至如《大墙上蒿行》中的“上有沧浪之天,今我难得久来视。下有蠕蠕之地,今我难得久来履”,《艳歌何尝行》中的“上惭沧浪之天,下顾黄口小儿。奈何复老心皇皇,独悲谁能知”都近于当时人民群众的语言。所以曹丕在诗歌上的成就,一面固由于他继承了三百篇、楚辞的优良传统,但最重要的还是向民间诗歌乐府歌辞的学习,这不仅使他从民歌现实主义传统中学习了反映现实生活的精神,同时在形式上,也取得了极其卓越的成就。

曹植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兄弟,在建安诗坛上是一位最杰出的诗人。由于他的秉赋和遭遇,使他在创作上,有着超越一时的非凡成就,并且形成了他自己独特风格。和他同时的作家杨修说他“握牍持笔,有所造作,若成诵在心,借手于书”(《答植书》)。可知他的才思是怎样的敏捷了。加上他生长在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学空气的家庭环境中,所以幼年在写作上,就放射出了天才的光芒,但也正因为这,造成了他一生的苦痛。这种苦痛的根源,即在于他的性格,同他所追求的理想之间的矛盾,以及他的客观环境和他的主观愿望之间的矛盾。由于这种矛盾,使他所追求的理想,遭到了失败。但也由于失败,才使他能够迸发出那样抑郁感愤,一唱三叹的诗篇来。

曹植是一个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的作家,《三国志》本传中说他“性简易,不治威仪。任性而行,不自雕励,饮酒不节”。由于他的文

思敏捷,曾得到曹操的重视,但又由于他的行为的率易,又使曹操对他感到失望,这是他在政治上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。但是他个人很不愿以文士自居,以文人终老,他有自己的抱负和理想,他《与杨德祖书》中说:

吾虽德薄,位为藩侯,犹庶几戮力上国,流惠下民,建永世之业,流金石之功。岂徒以翰墨为勋绩,辞赋为君子哉。

但是这种抱负和理想,只能成为个人的愿望和幻想。由于他不像曹丕那样“御之以术,矫情自饰”,使宫人左右,都替他讲话,这样在嗣位的问题上,就不得不失败了。而这正是注定他一生中痛苦的根源之一。有政治抱负,而在客观现实中又不容许他施展,但他自己又不肯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,因而抱恨无已,时时有着怀才不遇,美人迟暮之感。杂诗中第四首,就是他这种情绪的真实写照,这是他性格和他的理想的矛盾。其次,再看他客观环境和他主观愿望的矛盾。

我们已经知道曹植的出身家庭,是具有浓厚的文学空气和强烈的政治气氛的。这样就深深地影响到他的思想和行动,使他具有两种鲜明的倾向:一是文人名士的通脱不羁,其次是志士仁人的报国宏愿。而这就形成了他与曹丕间的尖锐矛盾。

首先他和曹丕夫人甄后的恋爱关系,这件事根据李善文选注中的《洛神赋》注,和当时的史事加以稽考,就可以知道这决不是后人的傅会。而这,正是曹丕对他嫉恶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另外在政治上,他们两人也存在着极深的矛盾。曹植在早年曾一度为曹操所器重,因之颇有一些文士像杨修、丁仪、丁廙等,靠拢他,称扬他,并且在曹操跟前提出立他为太子的话,因而很自然的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政治小集团,和以曹丕为中心的政治小集团进行着非常激烈的斗争。但结果,是他失败了。所以到操死后,丕即位,马上就剪除了他的羽翼,诛丁仪、丁廙,并其男口,接着贬他为安乡侯,后又改鄆城,又徙雍丘。

丕死后,睿即位,他又上表求自试,意欲“自效于明时,立功于圣世”,以实现他的“擒权,馘亮,混同域内”的理想。但曹睿正怕他树